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On the Criticism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

王宏印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046
W208

On the Criticism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

王宏印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 / 王宏印著.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7-81095-697-3

I. 文… II. 王… III. 文学-翻译-翻译理论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542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汪义群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697-3 / H · 270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王宗炎 (中山大学)

刘重德 (湖南师范大学)

主任委员:

庄智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白俭 (中国海洋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委员: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朱志瑜 (香港理工大学)

许 钧 (南京大学)

张佩瑶 (香港浸会大学)

张美芳 (澳门大学)

汪义群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罗选民 (清华大学)

郭建中 (浙江大学)

郭著章 (武汉大学)

廖七一 (四川外语学院)

谭载喜 (深圳大学)



总 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间争论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国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中国和外国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和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29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中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为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应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能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

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3

总
序



简论翻译批评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序

王宏印教授送来他的近作《文学翻译批评论稿》，读后颇有些感想，特写出来跟同道切磋。

王宏印教授熟知中外文论，又有翻译实践、教学与理论研究的经验与积累，因此他能借鉴文学批评建设的路子来构想文学翻译批评的建设。他抓住翻译理论、翻译批评与翻译史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把理论批评与鉴赏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把全书的理论构架分成八部分：理论准备；性质、类型与功能；主题、方法与程序；原则、标准与等级；文本、文体与互文性；文化参与；写作类型；学科地位等。这八个部分既比较全面，又构成了有逻辑关系的系统，而且每一部分既有自己研究的新成果，又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部著作的出版一定不会对文学翻译批评和译学理论建设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我过去选编《翻译新论》(1994)时对翻译批评发表过一些意见(主要在该书第12—13页；第622—623页；第630—631页等。对书中每篇文章写的述评共54篇，也可看作是翻译批评)，这几年又读了Newmark的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1988)，Wilss的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1982)，Reiss的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 Limitations* (2000)，姜治文、文军选编的《翻译批评论》(1999)，许钧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2001)和《翻译论》(2003)，杨晓荣的《翻译批评导论》(2005)等以及一些关于翻译批评的文章，我清楚地感到这个领域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首先是翻译批评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译文与原文对照的文本批评，译者的批评，而且有了翻译过程、译作影响与翻译理论的批评。单就理论批评

涉及的学科不只有翻译学、语言学、文体学、美学,还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符号学、叙述学等。当然还有元翻译批评,就是对翻译批评自身的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扩大,翻译批评的概念也就应该扩大了,所以说,翻译批评就成了研究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主体、行为、过程、结果、影响等问题的学问。说到元翻译批评,应该说这是翻译批评的重要理论研究,这里我要特别加以说明。系统科学产生之后,事物分层次的理论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方式,把一门学科的研究分出不同的层次,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去考察、研究和表述较低层次的性质,这样就有了理论的层次问题,即有了对象理论和元理论,从方法论来讲,也就有了元研究方法。学科的发展变化常从这个层次启动。对象理论和元理论的关系是相对的,以元理论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就是元元理论,可以这样类推。这是人类认识水平和研究能力的一大进步。纵观我国的学术史,因为我们过分看重实用,只重视实用技术,不重视科学理论,所以我们的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就很不够。我们虽然也有墨家逻辑,但是因为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形式,所以不具有方法论的作用,所以也就没有发展起来公理化的方法,同理,也没有把演绎逻辑发展起来。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只重视技术不重视科学,不行;只讲归纳不讲演绎,也不行;当然在理论研究上,只讲对象理论不讲元理论,也不行。倘若如此,那只能叫残缺不全。

其次,随着翻译批评范围的扩大而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事翻译批评的队伍问题,另一个是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前者和文艺批评队伍相比实在太小。文艺批评有专业队伍,翻译批评不但没有专业队伍,而想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也很少。现在多少做点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大都是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因为教学的需要,只是不得不做一些而已。当然也有少数对翻译事业和学科发展富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学者,认真做了一些翻译批评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代表了这个研究领域的主流方向,对我国的翻译批评及其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从总体来说,我们从事翻译批评的人员确实太少,跟翻译实践、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的需要很不相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原因比较复杂,但我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1)翻译学学科制度



(包括深层理念;学科规范系统;行政与法规管理系统)的研究还不够系统,致使学科还未能真正独立,从而取得应有的地位。(2)难度大,费功夫。翻译批评有多种类型,但要做得比较好都很不容易,比如全面系统的译文原文对照,译者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的系统研究,译作在目的语文化系统中的影响研究,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作为文化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译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元翻译理论的研究,还有翻译批评理论与元翻译批评理论的研究等等。这些翻译批评都不仅要求批评者水平高,能力强,而且还要求工夫大,所以能做并愿意做这类翻译批评的人就不会多。而现在所做的翻译批评比较多的是“校订式批评”和“译作鉴赏”。这也进一步证明深入开展高水平的翻译批评的确是件艰难的事情。当然不可否认这其中也有急功近利思想的干扰和破坏。(3)批评标准研究很不够。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的关系问题。过去不少人都认为二者基本一致,没有多少差别。那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现在批评的对象扩大了,标准自然增多了,当然二者的区别也就大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另一个问题是标准多元了,但各元标准的具体内容尚没有深入研究。比如文本批评需要各类文体的翻译评价标准,译者批评需要评价译者的标准,还有译作影响批评的标准、理论批评的标准、文化和思想批评的标准等,这些标准都没有认真研究,所以做起批评来也就不可避免的有明显的主观性与随意性,而较少客观性与准确性。

关于翻译批评标准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文学翻译批评的标准。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无法回避,其批评者的主观性问题也无法回避,只要是追求批评的客观性准确性,就必须研究“创造性”和“主观性”的度。这虽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但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面对这个困难的“度”,设计不同的评价指标,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不应停滞不前。文学翻译除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不同的样态之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变体,比如简译、编译、节译、摘译、译述等等,这些不同的变体都有优劣的评价问题,所以也都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若用同一个评价标准来评价它们,显然是不科学的。(2)以特定目的为本的译作评价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译者个人为特

殊目的而翻译的作品,还有一种是译者应译文使用者的特殊要求而翻译的作品。实际上这一类的译作也属于翻译的变体,评价这类译作也需要相应的评价标准,所以此类评价标准的研究也是不能忽视的。

一个学科、一个行业、一所大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建立先进的价值系统,用这个系统作标准,规划未来,指导行动,就可以健康发展。人的需要一般分两个系统,一个是满足种类需要的横向系统,比如文体的多样性;另一个是满足等级需要的纵向系统,比如优、良、中等不同的等级。种类的划分要有分类标准,等级的划分也需要评价标准,这两种标准就构成了价值的双向系统。所以翻译标准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个双向系统纵横关系的复杂性。

我们的翻译批评很弱,文学翻译批评似乎更弱。翻译实践、人才培养、学科建设都需要翻译批评,所以季羨林先生呼吁:“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地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现在批评很少,担负不起应有的职责来。这方面,必须大力加强才行。翻译的批评十分重要,不好的风气,不健康的翻译道德,如果不批评,任其泛滥,那怎么行?在30年代,鲁迅说过,翻译出了问题,翻译出版出了问题,翻译批评界有很大的责任。所以,我呼吁,现在要加强翻译批评,发挥批评应有的作用。”(《翻译论》,许钧著,第396页)

杨自俭

2005年6月20日

谨识于中国海洋大学六三居室



前言

假若文学翻译批评可以称得上是一门新兴学科,那么它当然应该属于一个更大的与翻译有关的学科领域,即“翻译学”。可是,是否一定要等待翻译学已经发展充分甚至完善才能考虑文学翻译批评的问题呢?我认为不必,因为学科建设的发展逻辑并非一定要遵循由大到小的产生顺序。至于目前是否已经具备建立文学翻译批评这一学科的基本条件,其回答当然不是完全具备或者完全没有具备,关键是我们自己是否具备必要的主体条件,来井井有条地讨论翻译批评的有关问题,从而为建立这个学科创造条件。这样,就客观方面的条件而言,不管具备与否,我们都可以谈论如何建设这个新兴的学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妨按照学科发展的理想条件提出一些基本的设想,作为我们介入这一学科的第一步。甚至可以说,缺乏关于学科建设的各种理想的条件的设想,就始终无法讨论文学翻译批评的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一个学科的设立,可以甚至必须借鉴相邻学科的经验 and 知识。本来,文学翻译批评就和文学批评处于交叉学科的关系,因此,借鉴文学批评的学科建构和历史经验,就成为一个近在咫尺的文化和智慧资源,为我们设定翻译批评条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参照。

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近邻和基础,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思路和借鉴。虽然这些思路是类比性的和类推性的,但仍然可以导致令人十分欣慰的成就感。例如,文学批评实际上产生于文艺学之前,它和文学创作几乎并肩前进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并不一定涉及理论论争的自然的开端——那就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

文学创作(文学史)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这在可以看得见的前景中已经呈现。又如,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长期不分家,又给我们提供警示,让我们一开始就注意翻译批评的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的区分与联系,以及翻译批评理论与一般翻译理论之间的交叉关系和可区分性特征。至于文学翻译批评与文学批评在诸多方面的相似性,例如,基本性质和社会功能,评判标准和操作程序,以及文类划分与变异规律,文学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等——都是既可以借鉴的,又必须警惕的。因为我们相信,任何一个新学科的诞生,其理论的探讨都是荒原上的耕作,在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实践上可以凭借的经验毕竟有限,而且整个探索总是充满历险的乐趣的。

正是这探索的乐趣在召唤和吸引着我们从荒原走向绿洲。在这片近乎荒芜的旷野上要寻求绿洲,我们必须有多方面的考虑和长远的发展眼光。这样,我们在关注文学领域三个彼此有关的分支学科,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以及反思和构建文学翻译领域内三个彼此相关的分支学科,即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翻译史的时候,就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更加自觉的做法。一方面,我们相信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复杂的联系,比如,翻译理论为翻译批评提供理论层面,而翻译史为翻译批评提供实证资料,二者共存统一于一个翻译批评的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等待翻译理论已经全部完善和翻译史已经编撰完成以后再着手进行翻译批评的构建工作。这样做便意味着我们在目前只能选择一条路单独行进,而不可能三条路同时并进,即我们这项研究只能集中解决翻译批评问题,而把其他两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解决。尽管如此,我们在进行翻译批评构建的时候,却不能完全不考虑翻译史的实践层面,特别是要联系翻译批评的历史与现状,加以必要的理论观照。同时,翻译批评理论的建设,又要求我们熟悉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和各个方面的发展,以便能够在宏伟的理论视野下考虑一系列翻译批评本身的问题。

这样,就迫使我们首先要系统地梳理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在这里是以学派观点的形式出现的,并由此进入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的一般勾勒,以便构成我们和读者共有的一个知识背景和经验领域。为此,我们甚至借助前人的研究追索了西方的批评概念及其演变

过程,企图从中寻求可以直接用于翻译批评的工具性借鉴。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忘记中国翻译史上的批评实践所关心和涉及的问题,以及当前国内翻译批评所存在的若干主要问题。在兼顾评判传统和继承传统的同时,我们一方面借鉴了传统译论的概念和习惯问题,另一方面也毫不回避传统翻译批评的弊病和陋习,给予它们适当的批评和提醒。而在观照现实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借助理论性的设定,给予富于理论思考的回答,但同时也在不得已时直接针对若干实际做法和非规范现象,对它们加以有节制的学术的抨击。至于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则未必能做到严丝无缝,浑然天成,这是自不待言的。

这个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系问题,而且也进一步涉及西学国学的结合问题,甚至涉及文学批评与文学翻译批评的相互关系问题,其未能解决得好甚至未能彻底解决,是显而易见的。无须讳言,一些基本的矛盾,在此项研究的目标和方法上,以及在本书的写法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本书的整体框架显示出西学和文学批评骨架的话,那么,在各章的布局、行文和笔调上,则显示出明显可感的中文写法和国学味道。其理论思考层面,体现在各章主要的基本概念的提出、界定和推演式逻辑与推理的展开过程中,而实践的操作层面,则表现为一系列附录的设定和若干操作守则一类条目论列的展示中。

毋庸讳言,本书的理论表述,除了科学研究框架所要求而不得不独立设想的范畴之外,还含有针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思维和超乎具体学科建设问题的反思维度。这种近乎思辨式的行文,并非故弄玄虚,乃是为了适应翻译专业博士生上课的需要——虽然全书的体系化建设还远远未能完成。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上许多近乎菜单式的罗列和点到为止的做法,甚至有些直接操作性指令式的行文习惯,则是考虑到文学翻译批评这门课程,还有一个实证的诗歌翻译鉴赏批评的层面(这门课的名称是“文学翻译批评与诗歌翻译鉴赏”),因而不能过分地逻辑化和哲学化,以至于无法照应实际的例证和操作的讨论。其实,我们在这样说的時候,就已经暴露出我们在学科建设上时有急功近利的做法,以至于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本文学翻译批评的原理性的书,其实是不能为文学翻译批评开列出出现成的操作法则的,它充其量只能规范和促进一门学科的诞生,而不能代替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翻译批评过程中的思考和判断。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笔者把文学翻译批评理解为鉴赏与研究的结合。作为一门课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说文学翻译批评的研究本身,作为有系统的理论思考开始于这门课的第一轮,其方式主要是原理的讲授,那么,鉴赏部分则是选择若干名篇名译和学生一起讨论,然后共同尝试理论的归纳——而又不能为归纳而归纳,即完全脱离开作品而讲翻译批评之道。当然,这样的做法,在写成一本书的时候,也不纯粹标志个人写作习惯的形成或改变,也不是说,文学翻译批评就一定要用这样的文笔和思路才是最好。鉴于该学科的特点,我们不能说,这种写法就体现或反映了它目前的不成熟状态——也许,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碰巧组合的体现,而不是冥冥中有什么决定论的东西,或者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什么。说句实在话,我不太喜欢“操纵”(摆布)这个字眼,甚至怀疑它在现代西方译论的中文版中频频出现,是一个误译。我也不相信,一切误读都导致创造。虽然创造,必须有工具的借鉴和学术的基础,再加上一点灵感和不自器的道的追索。

由此构成这本《文学翻译批评论稿》的写作背景的说明,和与读者对话的基础。本书若有疏讹错谬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王宏印

2005年6月

于南开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建立文学翻译批评的条件和设想 [1]

1. 译作问世
2. 人员准备
3. 译作研究
4. 评论发表
5. 学派论争
6. 规律探索
7. 学科建设

附录：文学批评的基本设定 [12]

第二章 理论的准备：从文学批评到文学翻译批评 [14]

第一节 批评概念：语源与演变 [14]

1. 西方批评概念的诞生与演变
2. 西方批评概念的含义与功能

第二节 文学批评：问题与流派 [20]

1.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2. 心理分析文学批评
3. 语言学文学批评
4. 形式主义文学批评
5. 神话-原型文学批评

6. 存在主义文学批评

附录：诗歌鉴赏批评十难 [30]

第三节 翻译批评：传统与借鉴 [32]

1. 西方翻译批评简史或三大翻译批评传统
2. 当前翻译批评思潮的三个转向
3. 中西学术交汇语境下的中国翻译批评发展策略

附录：传统《圣经》解读十法 [43]

第三章 翻译批评的性质、类型与功用 [46]

第一节 翻译批评的性质和特点 [46]

1. 翻译的实践性本质
2. 翻译批评需要实证基础
3. 具有知性性质的翻译批评活动
4. 文学翻译批评——高级的审美研究活动

第二节 翻译批评的类型和角度 [51]

1. 为理论的批评
2. 为创作的批评
3. 为翻译的批评

第三节 翻译批评的功能和作用 [60]

1. 导读功能
2. 评价功能
3. 导引功能

附录：习见翻译批评类型 [68]

第四章 翻译批评的主体、方法与操作程序 [73]

第一节 翻译批评者的主体认知因素 [73]

1. 文化认知回归：文化概念与文学翻译批评基础
2. 批评主体重建：文学翻译批评者的七大要素